

麵包與愛情：

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

吳乃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

摘要

過去幾次對台灣民眾的訪問調查研究發現：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在過去十年間，歷經大幅度的變動：中國民族認同的穩定衰退、無特定認同的「現實主義」者持續成長、以及台灣民族認同的勃興和歸於穩定。本文以一個追蹤訪問調查（1998/8—2000/12）的資料為基礎，除了指出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非常不穩定之外，同時也以實證資料評估「族群文化認同」和「物質利益考量」這兩個因素，對台灣民族認同態度之變動的影響。理性的「物質利益考慮」和「感情的歸屬」，是解釋認同本質的兩個對立理論。對「台灣人」和「台灣文化歷史」的宣揚，是興起中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基礎之一。

本文發表於台灣政治學會 2002 年年會，嘉義中正大學，12/14-15。本文所使用的資料，第一波調查訪問資料來自筆者主持、國科會支持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政治文化組，1998」。第二波調查訪問資料則來自筆者從事的「社會變遷訪問追蹤調查，2000/12」；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經費資助，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執行電話訪問調查。感謝上述兩個單位的經費支持，助理楊嘉容在統計資料上的協助，以及徐火炎教授在統計方法上的諮商。也感謝本刊兩位評審的評論和修改意見。錯誤當然應由自己負責。電子信箱：ntwu@gate.sinica.edu.tw。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頁 5-39，2005 年 12 月出版。

可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同時也面對一個非常不利的局勢：中國軍事強權的威脅和中國經濟市場的吸引力。「中國因素」和「台灣文化族群認同」這兩個方向相反的力量，對台灣民族主義者有何影響？在台灣民眾的認同中，麵包和愛情各發揮何種影響力？這是本文的主要問題意識。研究的初步發現是：就我們所研究的時間點而言，感情性認同吸力似乎大於物質利益的拉力。

關鍵詞：民族主義、民族認同、認同變動、台灣獨立、中國統一、
理性選擇

壹、前言

台灣民主化之後，政治領域中最顯著的議題是台灣民族認同的出現和勃興，以及它和原有的中國認同之衝突。民族認同的歧異是當前政黨唯一的分界線；對新民族認同的宣示、以及對舊民族認同的護衛，這項對抗形成台灣政黨競爭的重要基礎。民眾在民族認同上的對立，也成為當前社會中族群緊張的根源。先前的研究指出，本省和外省兩大政治族群在共處五十年之後，私人的社會關係雖然已經幾乎完全融合，可是民族認同的對立卻在這兩個族群間造成普遍性的政治不信任；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族群間社會交往的融合並不能降低此種因認同對立而來的政治不信任（吳乃德 2002）。可以說，民族認同是當代台灣政治最重要、最顯著的議題。同時，不論是現在或未來，民眾的民族認同之態度和內涵也都是兩岸關係中最重要的變數。

由於民族認同對台灣內部政治和國際政治都相當重要，使得它在近幾年獲得不少國內外學者的注意，而且也累積了相當

的成果。本文試圖瞭解一個不論在現實上或理論上都相當重要的問題：**來自中國的經濟利益之引誘，對新興的台灣民族認同造成何種影響？**在現實上，台灣民族認同可說是剛誕生不久即處於不利的環境中。雖然「台灣人的認同」、「台灣意識」或許早在日本殖民時期即已形成，可是「台灣意識」和台灣「民族認同」畢竟有段距離。而且更重要的，台灣的民族認同可以成爲公開的、群眾性的政治論述，只是近幾年的事。雖然這個新的民族想像是在民主體制中被建構，可是卻無法像其他民主國家中的民族主義運動（如魁北克）那樣，在容忍和節制的氛圍中被討論、被信仰、被選擇、被談判（negotiated）。這個新興的民族運動雖不若某些民族主義運動（如車臣）必須直接面對強權的武力壓制，可是也持續面臨強權的武力威脅和經濟上的引誘。瞭解這兩個因素對台灣民族認同可能產生何種影響，在現實政治上是一個迫切的問題。

而在民族主義的理論探討上，本文所欲探究的問題也有相當的重要性。在民族認同和其他群體認同的研究上，一直有兩個對立的理論觀點試圖解釋認同的本質。其中一個理論觀點將群體認同視爲個人對群體的原初的、感情的連繫。另一種觀點則認爲，群體認同基本上是以利益爲基礎的理性抉擇。事實上這也是晚近政治學中兩個不同的理論取向。很少人會否認，人類不論是私生活領域中的行爲或政治社會公領域中的公共行動，都同時受到感情/價值、和物質利益考慮所推動；而且這兩個行爲動機經常混雜難以分辨。比較重要的議題似乎不是對人類的行爲動機做「非彼即此」（either/or）的最終判定。在知識上可以獲得更大收穫的策略或許是探究：就某一特定現象而

言，哪一種動機有較大的解釋力？或者：對處於不同歷史情境中的相同現象，哪一種動機可能有較大的解釋力？本文的目的即是以目前可得的有限資料，試圖評估物質的經濟利益考慮、和感情的族群文化認同，這兩種不同的心理動機「在此時此地」對新興的台灣民族認同的影響。我們希望這個初步的研究，對上述民族主義研究中的爭論能提供某種程度的幫助。

本文所用的資料是分別在 1998 年 6 月和 2000 年 12 月，兩次對同一群受訪者所做的追蹤訪問調查。1998 年的資料來自國科會所支持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政治文化組」的全國性訪問調查，成功樣本數為 1798。2000 年的資料則是以 1998 年調查的受訪者為樣本，用電話訪問針對某些和認同相關的問題再做一次問卷調查。後一追蹤訪問的成功樣本總數為 1151；樣本流失率為 36%。經過兩年半，我們仍然成功地訪問到原先 64% 的受訪者；而且在第二波調查中成功訪問到的受訪者，其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省籍這四個基本變項都和原先的樣本差別不大。我們希望受訪者民族認同的態度在這兩個時間點上的變化，可以讓我們初步地評估「族群文化認同」和「經濟利益考量」這兩個因素對變動所造成的影響。

對「台灣人」和「台灣文化歷史」的宣揚，是興起中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基礎之一。可是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同時也面對一個非常不利的局勢：中國的軍事威脅和中國經濟市場的吸引力。「中國因素」和「台灣文化族群認同」這兩個方向相反的力量，對台灣民族主義者有何影響？在台灣民眾的認同中，麵包和愛情各發揮何種影響力？可能影響台灣民族認同的現實利益考量，除了經濟的引誘之外，當然還有軍事武力的威

脅。本文將把分析焦點只放在經濟利益的考量上。¹ 雖然有這樣的限制，我們仍然希望在未來對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化之深入和完整的分析上，本研究能提供若干的幫助和啓示。畢竟至目前為止，這是唯一以追蹤調查之資料為基礎的研究。也是第一次我們對民眾的民族認同的態度之變化或穩定，有一初步的了解。

貳、什麼是民族認同

在分析民族認同的變動如何受到族群文化、和現實物質因素的影響之前，我們必須先討論什麼是「民族認同」。在一般的用法、有時候甚至在學術討論中，民族(nation)和國家(state)經常被混淆。部份原因可能來自中文對這兩個概念沒有清楚的分辨。在社會科學的討論中，「國家」指的比較是一個「政治體制」，因其具有壟斷性武力，而在其轄區領域中擁有最高權威的行政和法律秩序(Weber 1978, 56)。可是在中文裡，國家除了可以是 state 之外，也可以是 country，更可以是 nation。National identity 因此經常被翻譯成「國家認同」。事實上「國家認同」指的是 national identity，亦即「民族認同」。可是由於中文在這幾個概念上的混淆，本地許多研究者在討論「國家認同」的時候，經常被名詞翻譯所誤導而分析了 state identity。

¹ 我們所用的問卷也包括關於中國武力威脅的題目。可是初步的分析發現：中國的武力威脅和台灣民族認同的變動，並沒有顯著的關係。原因可能是：武力威脅一直存在，特別是 1996 年的飛彈試射之後；可能是武力經常引起更大的敵對，如表一所示 1996 年飛彈危機後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急速增加。我們對「實用主義者」態度轉變的分析也發現：武力威脅的認知反而顯著預測他們轉變為「台灣民族主義者」。無論原因為何，本文將把焦點只放在對愛情和麵包的分析上。

可是是一個人可能「認同」(identify with)一個「國家」(state)嗎？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討論社會科學中關於(群體)「認同」的概念。

在歐美社會科學的傳統中，「認同」指的是將自己視為某一「群體」(group)的一份子，如「階級認同」、「性別認同」等。這些有關認同的社會現象，都是以具有某類特徵或特性的群體(種族、族群、階級、性別、政黨立場等)為對象，將自己視為該群體的一份子，並且因而認為自己和所屬的群體有共同的特性和利益，甚至共同的「命運」。正如Cerulo指出的，集體認同的概念來自古典社會學，包括涂爾幹的「集體良心」、馬克斯的「階級意識」。這個概念指涉一個群體的我族感(we-ness)。它強調群體份子所共同擁有類似或相同屬性(1997, 386)。David D. Laitin也對認同做這樣的定義，「社會認同是當人們自我宣稱、或被認定是屬於某一社會類屬的成員的時候，他們給自己的標籤、或因而被賦予的標籤；這個類屬和他們之間必須存在著令人(包括自己和別人)信服的相同歷史或行為上的連繫」(1998, 16)。² 也就是說，認同的對象是「群體」、是人所構成的群體；因為對某一群體的認同，個人認為他/她屬於該群體的一份子。可是「國家」卻是一個統治「權威」、政治權力「體制」。它不是一個我們可以歸屬、可以和它分享光榮和恥辱的「群體」。面對一個體制，一個人可能「支持」它、

² Laitin認為，「令人信服」(plausibility)的條件非常重要。他舉了一個例子：澳洲兩個白人小說家和白人畫家，為了推銷他們的作品都取了原住民的筆名。這件事被揭發之後，引起民眾甚大的憤怒，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欺騙行為，他們沒有權利捏造原住民的認同。這個例子清楚說明，雖然認同是「建構的」，可是也不能隨意建構，必須有某種事實的基礎，而且必須受到社會的認可。

「效忠」它、或「抵制」它，卻不可能「認同」它。事實上，民族主義之理念的核心之一正是：一群自認屬於相同「民族」（nation）的人，在政治上要求掌握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state）。也就是說，民族認同的對象是稱為「民族」的一群人，而目標則是建立一個僅屬於該群體的「國家」體制。以性別運動做比喻，認同的對象是「女人」，目標則是建立「兩性平權制度」；以階級認同做比喻，認同的對象是「勞工」，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或社會福利制度。事實上，在英文的著作中，民族認同也偶而會和國家效忠混淆，而成爲「民族主義的學術研究中最基本的錯誤」（Connor 1978, 380）。「民族和國家的混淆是日常生活語言所造成的基本錯誤」（Miller 1995, 19）。

爲什麼作爲一個群體的「民族」和作爲一個政治權威體制的「國家」，在民族主義的研究中常被混淆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民族主義運動經常和「國家」密不可分。Breuilly（1982, 3）以下列三個思想信條爲民族主義下了一個廣被引用的簡潔而清楚的定義：（1）存在著一個具有明顯而性格特殊的群體（民族）；（2）這個群體的利益和價值凌駕所有其它的利益和價值；（3）這個群體必須具有充分的政治主權。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爲某一個特殊的群體追求一個主權的「國家」。換言之，「民族」的範圍、或界線必須和「國家」的範圍或界線一致：不應有不同的民族存在於同一個主權國家底下；而同一個民族也只能有一個主權國家。在台灣民族主義者眼中，由於台灣和中國屬於不同的群體（民族），所以台灣必須有獨立的主權國家。而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由於台灣和中國屬於同一個群體（民族），所以必須接受一個統一的主權

國家。雖然雙方在政治上極端對立，可是所依據的民族主義原則卻完全相同。唯一的差異只是雙方對「民族」範圍之劃定有所不同。為民族追求一個屬於自己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是民族主義思潮的基本內涵之一，也是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任務之一。這也是為什麼民族認同經常和「國家」認同混淆的原因。

除此之外，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的特殊歷史經驗，也是民族和國家容易被混淆的重要原因。就民族和國家的起源關係而言，大致上有兩個路徑：一是先存的國家建構民族認同，如西歐各國；另一是形成中的民族、或已形成的民族追尋其自己國家，尤其是殖民地民族運動。中國的特殊性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之國家兩者不但同時出現，中華民國在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中扮演甚大的角色。在清末國民黨的革命運動中，一直沒有出現中華民族的概念。國民黨民族主義的內涵起初是「驅逐韃虜」的漢族族群民族主義。正如孫中山於 1906 年在民報紀元節演講中所說的，「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州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的國家」（李國祈 1994, 124）。這是明顯的以「漢族民族主義」為指導理念的民族革命運動，而非包含各民族的中華民族理念。在清朝帝國崩潰後，如何處理各民族的關係成為帝國的繼承者、以及當時的知識界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梁啟超先前所提出、卻未被重視（甚至為國民黨漢族民族主義革命派所敵視）的「中華民族」概念，獲得了新的生命。梁啟超曾在 1902 年首先使用「中華民族」的概念，雖然當時「中華民族」指的比較是漢族。可是梁在後來的論述中，「中

華民族」逐漸包含了各個民族（黃興濤 2002, 130-131）。共和革命之後，第一項建構「中華民族」的行動是由黃興等人於 1912 年三月組織的「中華民族大同會」。兩個月後，袁世凱更授意組成「五族國民合進會」，發起人包括黃興、蔡元培、黎元洪、段祺瑞等。該會的「會啓」宣稱，「滿、蒙、回、藏、漢五族國民，故同一血脈，同一枝派，同是父子兄弟之儔，無可疑者」（135）。打造「中華民族」的企圖雖已經出現，可是這樣的民族神話在五四運動之前並未成為主流（138）。中華民族的理念深入人心，應該是中華民國成立甚晚以後的事。

此種由國家和民族同時出現、並由國家建構民族的現象，讓國家和民族成為一體，經常讓兩者難以分辨。將兩者混淆的不只是學者，一般人也經常出現這樣的現象。1930 年一位作家在北京對一百位黃包車車伕做了問卷調查。當被問到「什麼是中華民國？」的時候，其中有五十位回答說「我們就是」、或「我們的國家就是」。其他的回答則包括「大漢的國土」、「五湖四海」、以及「炎黃子孫」等（Harrison 2001, 205）。後面半數受訪者的回答顯然混淆了國家和民族的區分。

對民族認同現象的掌握和測量，都決定於我們對認同的定義。「認同」的對象是群體（民族），在民族的疆界和範圍確定之後，才以民族之名要求一個具有主權的國家/政治權威。根據這樣的理解，我們在本文中沿用過去對民族認同的測量方式，瞭解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態度變化。這個方式是以受訪者對下面兩個題目的答案，聯列後分辨出主要的三群人。「如果台灣獨立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國維持和平的關係，請問你是不是贊成台灣獨立？」、「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大致相

當，你是不是贊成中國統一？」同意第一個問題、而不同意第二個問題者，為「台灣民族主義者」；不論中國是否自由民主、繁榮富裕，他們都不願意和中國統一。同意第二個問題、而不同意第一個問題者，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即使台灣獨立不會帶來戰爭，他們也不願意台灣獨立。對兩個問題都同意者，本文暫時定義為「實用主義者」；統一或獨立他們都可以接受，只要政治制度、經濟利益和社會福祉受到保障。以此種方式測量民族認同的主要理由是：在現階段的政治環境中，因為現實條件（武力威脅和兩岸發展差距）的「干擾」，一般民眾的民族認同和其統獨立場有甚大的不一致性。此種測量方式祛除了這些現實條件，讓民眾的民族認同可以充分表現。對此測量方式的邏輯和理論的更仔細討論，參見吳乃德（1993）。這個測量方式受到許多研究民族主義學者的使用。大多數的沿用者都遵守學術倫理和道德規範，註明出處和原始設計者，如徐火炎（1996）；Marsh（2002）；Niou（2004）等。有些則否，如Chu [朱雲漢]（2004）。後者沒有註明這個測量方式的來源，同時將「台灣民族主義者」改稱為「有原則的台灣獨立信仰者」，「中國民族主義者」改稱為「有原則的統一信仰者」，「實用主義者」則改稱為「心胸開放的理性主義者」。論文讀起來很像是他自己的創見。

參、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趨勢和變動

表一所載是從1992年到2000年，這8年間訪問調查所收集到的資料。這些資料似乎顯示一個長期穩定的趨勢。最大的變動發生在1996年前後。所有三群主要的民族主義者，都有

激烈的變動：「台灣民族主義者」加倍成長，「中國民族主義者」大幅度降低，「實用主義者」也大幅度成長。（一個最可能的解釋當然是飛彈危機的效果。我們知道，武力的對抗/威脅經常造成「敵我意識」，也就是認同的強化、或形成，如英法戰爭對英國認同的形成。）不過自從 1996 年之後，這三群人的比例就大致維持相當穩定的局面。最大的一群民族主義者類型一直是「實用主義者」，也就是沒有特定民族認同的人。「台灣民族主義者」次之，「中國民族主義者」最小。沒有特定民族認同的人居然在人口中佔最多數，這應該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案例。

人口中的大部分竟然沒有特定的民族認同，這樣的現象值得繼續深究。未來研究「實用主義」的幾個重要方向應該是，第一，這些「實用主義者」到底是沒有任何民族認同，或同時具有兩個認同、只是不願在「中國」和「台灣」之間作抉擇？他們到底是因為處於現代世界中和全球化的趨勢下，覺得民族認同根本就不重要，理性的物質和制度滿足比較重要；還是處於台灣和中國的複雜關係中，暫時不願在兩個民族認同之間做抉擇？以上的研究方向是假設「認同」為理性的抉擇。如果我們假設「認同」在本質上是感情的依附，那麼關於「實用主義」的解釋，可以有另一個研究方向：在台灣的特殊情境下，原有的中國民族認同衰退，可是由於新的（感情）認同須要時間建立，新的台灣民族認同尚未普遍建立。不論這些問題的答案是什麼，對民族主義的理論都有重要的意涵；這應該是未來研究的重要課題。

表一：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1992、1993、1996、1998、2000）

		N (%)			
		統一（若經濟社會政治等條件沒有差距）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總數
1992.2					
1993.2					
1996.5					
1998.7					
1998.7*					
2000.8					
2000.12*					
獨立 (若能維持和平)	同意	II 311(25.0)	29(2.3)	I 116(9.3)	456(36.7)
		341(25.4)	27(2.0)	138(10.3)	506(37.7)
		540(38.8)	38(2.7)	296(21.3)	874(62.8)
		637(36.0)	83(4.7)	396(22.4)	1116(63.2)
		428(37.2)*	55(4.8)	256(22.2)*	739(64.2)
		485(34.4)	35(2.5)	338(24.0)	858(60.9)
		500(43.4)*	62(5.4)	199(17.3)*	761(66.1)
	沒意見	45(3.6)	82(6.6)	12(1.0)	139(11.2)
		54(4.0)	267(19.9)	18(1.3)	339(25.2)
		46(3.3)	173(12.3)	9(1.4)	238(17.1)
		66(3.7)	133(7.5)	26(1.5)	225(12.7)
		42(3.6)	92(8.0)	18(1.6)	152(13.2)
		33(2.3)	127(9.0)	8(0.6)	168(11.9)
		57(5.0)	103(8.9)	15(1.3)	175(15.2)
	不同意	III 472(38.0)	39(3.1)	137(11.0)	648(52.1)
		371(27.6)	27(2.0)	100(7.4)	498(37.1)
		235(16.9)	5(0.4)	40(2.9)	280(20.1)
		297(16.8)	27(1.5)	102(5.8)	426(24.1)
		176(15.3)*	13(1.1)	71(6.2)	260(22.6)
		272(19.3)	18(1.3)	93(6.6)	383(27.2)
		157(13.6)*	26(2.3)	32(2.8)	215(18.7)
總數	828(66.6)	150(12.1)	265(21.3)	1243(100.0)	
	766(57.0)	321(23.9)	256(19.1)	1343(100.0)	
	821(59.0)	216(15.6)	355(25.5)	1382(100.0)	
	1000(56.6)	243(13.8)	524(29.7)	1767(100.0)	
	646(56.1)	160(13.9)	345(30.0)	1151(100.0)	
	790(56.1)	180(12.8)	439(31.2)	1409(100.0)	
	714(62.0)	191(16.6)	246(21.4)	1151(100.0)	

說明：I：台灣民族主義，II：實用主義，III：中國民族主義，*：同一樣本之追蹤調查。

以上根據數次調查所發現的穩定現象說不定只是表象。事實上，我們的追蹤調查發現：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其實處於高度不穩定的流動現象。這個高度流動的現象為橫切式調查所涵蓋。過去調查所獲得的長期穩定趨勢，似乎是高度流動互相抵銷而導致的錯覺。這些大致穩定的數字隱藏了三個民族主義群之間高度互相流動的現象。以表一中打*號的這兩筆資料為例。這兩筆資料是在不同時間對同一群受訪者所做的追蹤調查；表內兩年的數字都是第二次訪問到的樣本。所以是總數一樣的同一群人。這同一群人在不同年代中的態度分配，似乎是相當穩定的。「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比例在兩年間的差距只有5%，「中國民族主義者」則只有2%的變動。「實用主義者」的變動較大，可是也只有7%左右。這似乎支持某些社會科學家認為認同不容易變動的說法。

可是如果我們將個別受訪者在這兩年的態度加以對照分析，我們發現事實遠非如此。如表二所示，在1998年是「台灣民族主義者」中，只有38.1%在2000年仍然維持不變。而有高達41.1%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轉變成為「實用主義者」。(也就是說，其中四成的受訪者開始可以接受有條件的中國統一。)

「中國民族主義者」中也出現高度浮動的現象：在兩年後仍然堅持中國民族主義之態度者，不到四成(37.8%)。他們中同樣有四成左右變成「實用主義者」。(也就是說，其中四成的受訪者開始可以接受有條件的台灣獨立。)至於原來的「實用主義者」，雖然態度較為穩定，可是其中也有多於兩成左右的人皈依某種民族認同。維持不變的只有六成左右。**也就是說，我們在表一中所觀察到的相當穩定的現象，其實只是不同的認同群**

表二：民族認同的變化（1998-2000）

1998	2000	% (N)
台灣民族主義	台灣民族主義	38.1 (91)
22.4 (239)	實用主義	41.4 (99)
	中國民族主義	3.8 (9)
	其他	16.7 (40)

現實主義	實用主義	60.4 (247)
38.4 (409)	台灣民族主義	12.2 (50)
	中國民族主義	10.5 (43)
	其他	16.9 (69)

中國民族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	37.8 (65)
16.1 (172)	台灣民族主義	8.7 (15)
	實用主義	37.2 (64)
	其他	16.3 (28)

其他	其他	31.7 (78)
23.1 (246)	台灣民族主義	16.7 (41)
	實用主義	36.2 (89)
	中國民族主義	15.4 (38)

100.0 (1066)		

同時在高度浮動性之下相互抵銷所造成的錯覺。

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呢？對這些不同的認同群中，「變」與「不變」的受訪者作初步的分析，我們發現：性別、年齡、教育的效果都不顯著。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基本教義派」（一個主流論述詆毀認同的標籤），也就是堅定的不變者，並非由較年長、和/或教育程度較低者所構成。其他認同群的態度轉變，和這幾個變項也都沒有顯著的關係（參見附錄表一）。

一個解釋高度浮動現象的可能因素是，美國研究選民投票行為學者所說的「政治知識的不良分配」：一般民眾的政治知識「平均分數很低，而變異很大」（Converse 2000, 331）。在政治知識不足、政治關心不夠的情況下，受訪者不是隨便回答、就是回答的時候受到訪問當時偶發事件過大的影響。對民族認同的問題毫不關心、或缺乏深思熟慮，導致了他們兩年的態度有高度的浮動性。為了檢查這個可能性，我們以問卷中幾個關於「政治關心」、「政治興趣」、和「政治知識」共 13 道題目，建構一個「政治意識」的指標。對三個認同群中的改變者與未變者的政治意識作初步的分析，我們確實發現：政治意識較高的受訪者，認同改變的傾向較小。可是其間的關係並非很顯著（參見表二）；後文更仔細的統計模型分析也進一步顯示，認同的變動並非來自較低政治意識的影響。

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這樣大幅度的變動？我們所仰賴的此種大規模問卷調查，當然無法讓我們對造成認同變動的原因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討。目前我們只能以這筆資料初步瞭解兩個重要因素（物質的經濟利益和感情的文化認同），對台灣民族

主義態度改變所產生的作用。同時也評估這兩個作用力相反的因素，何者的作用力較強。

本文的目標集中在分析環境變動對「台灣民族主義」所造成的影響。如表二所示，民族認同的三大類屬在兩年半的時間內都發生了變動。不同類屬的民族主義者的態度變動，應該是由不同因素所造成。目前我們缺乏實證資料，評估這些可能因素對不同群認同者所造成的影響。這應該是後續研究的重要題目。除此之外，表二也透露一個我們目前無法深究、卻可能非常重要的現象。比較表二所載的三大類民族認同者的變化，我們發現「實用主義者」的穩定性比「台灣民族主義者」和「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穩定性還高。³ 為什麼「實用主義者」的態度比較穩定呢？我們暫時擱置「社會壓力」的作用（不論是來自政治場域或初級團體），而以環境變化為焦點，提出一個可能的解釋方向。我們知道實用主義者對台灣或中國都沒有特定的偏好，對「台灣獨立」和「中國統一」這兩個選項都可以接受。因此他們比較不會受到現實環境變動的影響，例如因為中國的經濟崛起而偏向中國、放棄台灣認同，或北京對台灣的打壓而偏向台灣、對中國敵對。這些大環境的變動都在他們的（雙重）認同架構內，不會和他們的原始態度有所衝突，而形成改變的壓力。可是台灣認同和中國認同就不一樣了。對台灣民族主義者而言，面對中國的崛起和台灣經濟的困頓，他們中有些人會開始檢討「任何條件不和中國統一」的原始態度。當他們的原始態度轉變為「同意條件式的統一」，就成了「實用主義

³ 感謝一位評審指出這個我先前沒有注意到的重要現象。我覺得這是一個應該繼續深究、而且也是對台灣民族認同的理論分析非常重要的線索。

者」，轉變為「不知道」（不確定），就成了「其他」類。中國民族主義者也同樣容易受到環境變化的影響。面對逐漸強烈的台灣自主意識，以及中國不斷的武力恫嚇和打壓，他們之中有些人或許對開始接受條件式的獨立而成為「實用主義者」。無論如何，這些只能留待將來進一步的分析和驗證。

肆、麵包和愛情

關於民族認同的本質，目前有兩個互相競爭的理論：理性的物質利益論和感情的群體認同論。理性的物質利益論導源自「理性抉擇模型」；感情的群體認同論則強調價值和感情，在人類行為中的重要性。這兩者是社會科學者在解釋社會行為（特別是政治行為）的時候，經常依據的前提假設。

Russell Hardin 是「理性抉擇模型」陣營中一個辛勤又多產的宣揚者。他認為，民族認同（以及其他所有種類的群體認同）的本質，其實就是認同者的自我利益。理性抉擇模型將具有說服力，如果（1）自我利益和群體認同經常是一致的；同時（2）一個對群體或民族有利的行為，如果個人從事這項行為的代價愈高，這種行為就會愈少發生（Hardin 1995, 15）。Hardin 同時認為，雖然群體認同的本質是理性的利益考慮，可是用「理性抉擇模型」解釋集體行為經常會遭遇的質疑—囚犯難題，在民族認同中並不會發生。因為民族認同此種集體行為乃是一種「諧和遊戲」（coordination game）。諧和遊戲的本質是不和別人合作的「搭便車者」並不會得利，反而會遭受損失。開車靠右就是一種諧和遊戲。如果所有的人都靠右開車，不追隨主流、拒絕和別人合作者將遭受撞車的重大損失。因此，諧和遊

戲不若「囚犯遊戲」那樣需要法律的強制才能克服搭便車的難題，以保障所有人的合作；它需要的是個人對多數人行動的認知。當大多數人都認同某一種文化的時候，不加入主流認同的人反而會吃虧。

「理性抉擇模型」的另一健將 Michael Hechter (2000) 則直接處理 Hardin 所提出的第一個判準。第二個判準似乎不證自明：同樣是台獨基本教義派的人當中，願意為民族的尊嚴犧牲生命的人，鐵定不是很多。另外一個例證是當認同必須付出太高的代價的時候，認同經常被拋棄。例如在中世紀許多猶太人面臨可能遭受宗教審判的危險的時候都改信了天主教。Hechter 認為，下面幾點可以支持認同的本質是利益考慮的論點。(1) 對「地方」(或邊陲)民族的政治、文化、或宗教菁英而言，當「中央」的勢力愈來愈強的時候，主張民族主義可以保護它們的力量免於被邊緣化。當中央的勢力開始衰退(例如帝國、或殖民國開始崩潰)的時候，推動民族獨立運動可以擴充其權力。(2) 就一般的公民而言，許多人相信：一個由同一民族所組成的政權，其推動的社會和文化政策，應該比較有利於民族的所有成員。(3) 就一般的民族成員而言，當民族的地位獲得提昇或尊重，所有個別的成員的地位 (self-esteem) 也都獲得提昇和尊重 (2000, 30-31)。

關於以上第一個論點，我們不能以政治菁英的動機來代表所有參與或支持民族運動的群眾，就像分析社會運動、或民主運動不能用「政治企業家」來代表群眾參與運動的動機。政治菁英經常有其特殊的考量和利益。當然，我們也無須憤世嫉俗至認為所有的政治菁英都只是為了個人利益。事實上有許多政

治人物，他們行動的動機是來自價值理念和公共利益。針對第二個論點，要求政府由同一民族的成員組成，這樣的心理經常不是因為民族成員所制訂的政策比較符合民族的利益（雖然義大利的司法非常腐化，可是他們從來不會想到請德國人去當司法官），更重要的原因是：這是「歸屬感」的一部份。State 在現代社會中非常重要。民族認同不只要求文化是「我們的」，當然也要求「國家」是「我們的」，也就是說統治權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這也是為何民族主義要追求 nation 和 state 一致的原因。針對第三點，我覺得有點像是在說，許多父母縮衣節食（就像我們的上一代那樣）辛苦工作讓小孩唸書，完全是自私的考慮。當然有一小部分的窮苦小孩終究可以成為醫生或律師，父親的地位也因此提昇，生活因此改善。所以我們就結論說，父親的辛苦完全是基於自利的考慮。這是一個荒唐的分析。每一個民族的成員當然可以因整個民族地位的提昇而同時提昇。可是他不用為了一個經常是遙不可及的理念，去犧牲享受、享受犧牲。

由於許多人會為民族的集體利益犧牲，在危機時期為保衛民族的集體利益而寧願涉險（如參戰）的人甚至可以達到數百萬，讓許多學者認為民族認同的本質比較是感情的連繫（affective bond），而非物質利益的考量。正如 Raymond Aron 對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評論所說的，雖然阿爾及利亞人在法國統治下能有較優渥的物質生活，可是這卻不是一個會被他們列入考慮的因素。「期待人們會因為利益而犧牲熱情，等於是否定了我們這個世紀的經驗」（摘自 Judt 1998, 166）。而這個熱情或許就是 Isaiah Berlin 所分析的，「民族主義經常源自因人的

尊嚴受到傷害、或受到激怒，而產生的被認可的慾望，這樣的慾望確然是推動人類歷史的最偉大力量之一」（1996, 252）。否則我們無法解釋眾多為民族利益而做出巨大犧牲的現象，因為「人不會因為利益而去讓自己被殺死；他們因為激情而讓自己被殺死」（Connor 1994, 206）。而感情的連繫主要似乎來自對族群文化的認同。Anthony D. Smith 是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中，最為強調族群在民族建構過程中之重要性的人。他認為不論是西方的「領土式民族」（如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瑞典、和俄國），或是東方的「族群民族」（如東歐和中東地區），族群在民族建構過程中都扮演甚重要的角色。在領土式的民族建構歷史過程中，核心族群在民族開始建構之前已經成功地整合、吸收鄰近的族群成為單一的文化族群。民族建構的主要任務因此是以該族群的領土範圍建立單一的政治社區。由於文化的同一性，民族建構中所強調的不是文化，而是公民身份以及對政治社區的效忠和認同。而在族群式的民族建構歷史過程中，當民族開始建構的時候，各族群的歷史和文化認同早已各自建立。民族建構的首要任務因此特別強調（優勢族群的）文化、歷史認同以整合鄰近地區的族群。因此，即使是經常被歸類為「公民/領土民族主義」的民族建構仍然具有十足的族群基礎，而且也經常鼓勵對族群文化的認同；而族群民族主義雖然強調文化，卻也經常包含對政治社區的效忠（Smith 1986）。

此種對族群文化的認同是群體感情依附的來源。法國經常被認為是「公民民族主義」的典範，可是法國人的民族認同的本質卻如其歷史學者、民族主義者米敘烈（Jules Michelet）的例子所反應的，感受到「民族靈魂的存在。民族乃是精神的活

體具現，是所有智性生活的泉源。...將法國當成一個活生生的人來愛戀...並且將法國的歷史視為其道德成長的紀錄」(Kohn 1952, 47)。米敘烈一生所撰寫的甚多卷法國歷史，唯一的目的都在為了紀錄、並提昇法國的道德精神。他在七十一歲時為其著作所寫的序言中，提到法國的時候就像一個溫柔的愛人，

曾經和我共同生活的親愛法國，如今我即將懷著悔恨之情離開他。我們曾經共同度過多少激情的、高尚的、幽暗的時刻。我曾經為你工作，我曾經離開你然後又回到你身邊，我搜尋、我寫作。我為你付出每一天、付出我曾經擁有的一切，或許更多。現在，我偉大的法國，為了召喚您復甦，一個人如果必須奉獻他的生命，必須來回反覆地渡過死亡的河流，他其實也從中獲得無上的安慰；他其實必須感謝你。他最大的憂傷是，他現在必須離你而去 (45-47)。

許多民族主義運動也清楚顯示了感情因素在民族認同中的重要性。一位作家在談到北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時候這樣說，「沒有任何一個西方世界的政治運動如此地脫離政治現實、如此有意識地要求自我犧牲、對其成員承諾如此多的痛苦和死亡，可是又提供這麼少的回報」(Toolis 2000, 25)。某一個愛爾蘭父親為犧牲生命的兒子(父親為兒子，不是同志為同志)所立的墓碑上的一段文字，最足以表現此種民族認同的性質和強度：

*I lived my short life to the full
But also heard my nation's cry
With my comrades I answered her call*

Prepared to fight, prepared to die
So loving, so brave, so sadly missed
With love and pride
Our precious son and brother (338)

生命是最大的利益；沒有生命還有什麼？如果民族認同是為了利益，那麼當生命不在的時候，還有什麼利益可言？Benedict Anderson 也說，在這樣一個民族主義被進步的知識份子視為是植根於恐懼和憎恨的年代中，「提醒我們自己，民族激發愛、而且經常是深邃的自我犧牲的愛，應該不無益處。民族主義的文化產品—詩歌、散文、小說、音樂、美術，都清楚地以千種形式和風格，展示了這樣的愛」（Anderson 1991, 141）。

現實利益或感情連結？這個問題是社會科學的核心難題、或論戰。過去一直由理性抉擇模型所宰制的政治學，近幾年也出現了反動的現象（吳乃德 2000）。論戰尚未結束。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參加這個戰鬥。可是欲理解我們所關心的社會現象，我們不能不密切注意戰局。就民族認同的本質而言，或許是如 Hroch（1985）所說，民族認同和物質利益「這兩個元素是互相輔助的...當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反映了宣揚它的群體之利益、或至少接近其利益的時候，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動員是最有效的」（12）。當然，此種兩種因素都承認的妥協戰略，並非永遠都奏效。它或可以解釋，當中國既落後、又獨裁的時候，台灣民族主義的快速成長。可是當中國不再落後、或甚至出現民主的可能性的時候，台灣民族主義將會有何變動？或者，一個對台灣的族群文化強烈認同的人，當他相信必須和中國統一，台灣的經濟才可能繼續發展的時候，他有多

少可能性堅持其認同，犧牲麵包？有多大的可能性不顧麵包，而繼續保有他對台灣的「愛」？

以下我們將初步探討，台灣民族主義者的變動中，愛情和麵包是否各扮演一定的角色？同時，哪一個角色取得主導的地位？

表三是對台灣族群文化認同和民族主義轉變的聯列分析。兩者的關係非常清楚。對「台灣人」的認同是鞏固台灣民族主義的重要因素。A 表示選擇 1998 年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作為分析對象。在該年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受訪者中，有將近一半在兩年後沒有改變他們對台灣民族的認同態度。相較而言，有雙重認同或自認為「中國人」的受訪者，在兩年後只有兩成左右仍然固守其台灣民族認同。台灣族群文化認同對民族認同態度改變的影響力，同樣作用於「實用主義者」身上。如果實用主義者的民族認同態度改變的話，具有台灣族群文化認同者較容易轉變成台灣民族主義者。

表三：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轉變（1998-2000）

(A) 台灣民族主義者 (1998)					(N)%
	不變	2000			總計
		變成 實用主義	變成 中國民族主義	變成 其他	
臺灣人	(69) 50.4 78.4	(47) 34.3 49.0	(1) .7 12.5	(20) 14.6 51.3	(137) 100.0 59.3
臺灣人 也是中 國人	(15) 19.7 17.0	(41) 53.9 42.7	(4) 5.3 50.0	(16) 21.1 41.0	(76) 100.0 32.9
中國人	(4) 22.2 4.5	(8) 44.4 8.3	(3) 16.7 37.5	(3) 16.7 7.7	(18) 100.0 7.8
總計	(88) 38.1	(96) 41.6	(8) 3.5	(39) 16.9	(231) 100.0

$\chi^2=31.839$ df=6 p<.001

(B) 實用主義者 (1998)					(N)%
	不變	2000			總計
		變成 台灣民族 主義	變成 中國民族 主義	變成 其他	
臺灣人	(77) 55.4 31.7	(26) 18.7 53.1	(8) 5.8 18.6	(28) 20.1 42.4	(139) 100.0 34.7
臺灣人 也是中 國人	(127) 65.5 52.3	(19) 9.8 38.8	(18) 9.3 41.9	(30) 15.5 45.5	(194) 100.0 48.4
中國人	(39) 57.4 16.0	(4) 5.9 8.2	(17) 25.0 39.5	(8) 11.8 12.1	(68) 100.0 17.0
總計	(243) 60.6	(49) 12.2	(43) 10.7	(66) 16.5	(401) 100.0

$\chi^2=28.127$ df=6 p<.001

表四：經濟利益與民族認同轉變（1998-2000）

(A) 台灣民族主義者 (1998)		2000			(N)%
	不變	變成 實用主義	變成 中國民族 主義	變成 其他	總計
同意*	(12)	(32)	(2)	(8)	(54)
	22.2	59.3	3.7	14.8	100.0
	13.2	32.3	22.2	20.0	22.6
其他	(6)	(13)	(3)	(14)	(36)
	16.7	36.1	8.3	38.9	100.0
	6.6	13.1	33.3	35.0	15.1
不同意	(73)	(54)	(4)	(18)	(149)
	49.0	36.2	2.7	12.1	100.0
	80.2	54.5	44.4	45.0	62.3
總計	(91)	(99)	(9)	(40)	(239)
	38.1	41.4	3.8	16.7	100.0

$\chi^2=32.983$ df=6 p<.001

(B) 實用主義者 (1998)		2000			(N)%
	不變	變成 台灣民族 主義	變成 中國民族 主義	變成 其他	總計
同意	(118)	(12)	(32)	(26)	(188)
	62.8	6.4	17.0	13.8	100.0
	47.8	24.0	74.4	37.7	46.0
其他	(25)	(4)	--	(23)	(52)
	48.1	7.7	--	44.2	100.0
	10.1	8.0	--	33.3	12.7
不同意	(104)	(34)	(11)	(20)	(169)
	61.5	20.1	6.5	11.8	100.0
	42.1	68.0	25.6	29.0	41.3
總計	(247)	(50)	(43)	(69)	(409)
	60.4	12.2	10.5	16.9	100.0

$\chi^2=58.517$ df=6 p<.001

說明：「經濟利益」的測量題目為：「有人認為，和中國統一，台灣的經濟才可以繼續成長。」

至於作用力相反的經濟利益對民族認同的改變有何影響？我們以「有人認為，和中國統一，台灣的經濟才可以繼續成長」，來測量經濟利益。表四評估經濟因素對民族認同轉變的影響。表四顯示：在 1998 年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中，同意「和中國統一，台灣的經濟才可以繼續成長」的人中，只有兩成多人在 2000 年仍然是台灣民族主義者。而不同意者有將近五成沒有改變其態度。認為台灣的經濟前途必須仰賴中國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似乎比較容易放棄他們原有的台灣認同。經濟因素對實用主義者態度的改變，同樣有顯著的影響力。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基本上並不影響實用主義者態度的轉變或固定（他們本就是在兩岸發展相當的情況下，可以接受統一的人）。可是如果他們態度轉變的話，經濟因素卻顯著影響轉變的方向。認為和中國統一台灣經濟才有希望的實用主義者，如果態度轉變，比較傾向於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者。反之，認為台灣經濟不需靠中國統一的人，則比較傾向轉變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

以上兩個表都顯示了物質利益和文化認同對民族主義態度的顯著作用。至於哪一個因素對民族認同的鞏固或轉變的作用比較大呢？我們用三個統計模型試圖比較其影響力（參見表五）。當模型同時包含兩個變數，整個模型的解釋力是.112；如果只放進經濟因素，而不放進族群文化認同，模型的解釋力降至.061。而如果不放進經濟因素，只放族群認同，則模型解釋力仍有.094。這些數字似乎顯示：族群文化認同的鞏固力量，大於物質經濟利益考慮的轉變力量。在 1998 年的時候，經濟因素雖然顯著地影響台灣民族認同的改變，可是台灣的族群文化認同對台灣民族認同似乎有更大的鞏固力。

表五：預測民族認同轉變（1998-2000）之邏輯迴歸模型

預測變項：台灣民族主義（不變者=0，轉變者=1）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β (se)	odds ratio	β (se)	odds ratio	β (se)	odds ratio
性別 (女性=0)						
	-.2292 (.3134)		-.1697 (.3003)		-.2228 (.3104)	
	.7952		.8439		.8003	
年齡 (20~29=0)						
30~39	.0917 (.4810)		.2746 (.4592)		.0617 (.4732)	
	1.0960		1.3160		1.0636	
40~49	-.0844 (.4742)		.1054 (.4529)		-.1456 (.4686)	
	.9191		1.1112		.8645	
50~59	-.2309 (.5702)		-.1658 (.5465)		-.2799 (.5674)	
	.7938		.8472		.7558	
60~	.4666 (.6538)		.4594 (.6306)		.3436 (.6433)	
	1.5946		1.5831		1.4100	
省籍 (本省=0)						
	1.7114 (1.1049)		2.0647 (1.0701)		1.6245 (1.0949)	
	5.5366		7.8830		5.0758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β (se)	odds ratio	β (se)	odds ratio	β (se)	odds ratio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0)						
高中職	-.5782 (.3543)		-.4566 (.3391)		-.5443 (.3512)	
專科以上	.5609		.6334		.5803	
經濟利益 (不同意/其他=0)	-.0094 (.6223)		.0696 (.5932)		-.0855 (.6115)	
族群認同 (台灣人認同=0)	.9906		1.0720		.9181	
政治意識	.8768 (.3859) *		.9732 (.3716) **		--	
常數	2.4032		2.6464		--	
N	1.2091 (.3146) ***		--		1.2622 (.3109) ***	
LR χ^2	3.3504		--		3.5333	
Pseudo R ²	-.1079 (.2651)		-.2083 (.2559)		-.0935 (.2604)	
	.8977		.8119		.9108	
	.4401 (.6089)		.8523 (.5823)		.5979 (.5977)	
	235		235		235	
	34.92		19.09		29.38	
	.1120		.0612		.0942	

*: p<.05, **: p<.01, ***: p<.001

伍、討論

民族主義理論對民族認同本質的理解，存在著兩個對立的取向：理性的利益考量和感情性的社群連繫。事實上，民族認同的態度和其他大多數的政治態度及政治行為一樣，同時受到這兩個因素的影響。新生的台灣民族認同也同時受到這兩個因素的影響。本文所仰賴的追蹤訪問調查研究發現，第一，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態度甚至在短期內都歷經甚大的浮動。第二，在該調查的時間點上，基於族群文化的感情連繫的鞏固力量，似乎大於經濟引誘所產生的轉變趨力。然而這只是一個初步的探索。我們的分析受到研究方法和資料的許多限制，有賴未來的研究加以補充和修正。例如以「自認為台灣人還是中國人」來測量「族群文化認同」似乎過於單薄，我們須要更多的題目來探索族群文化認同；而且這個問法似乎也容易和政治性的「民族認同」混淆。又例如「經濟利益」的測量，本研究所依賴的資料只詢問了受訪者對經濟前景的總體評估，而缺少更仔細探究中國市場對受訪者經濟生活的重要性，如投資和就業等。這些都是未來的研究必須探索的問題。無論如何，民族認同本身就是一個複雜、且不易捉摸的現象。在其新興階段更是如此。欲確切地掌握台灣民族認同的趨勢，欲豐腴我們民族主義和民族認同的知識，我們須要更細緻、更深入的研究。

（收件：2004年9月21日，最後修正寄回：2005年9月14日，接受：2005年9月21日）

附錄

表一：民族認同與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選擇98年為台灣民族主義者)

(N) %

		民族認同的轉變('98~'00)		
		未轉變	轉變	總計
性別	男性	(53)	(73)	(126)
		42.1	57.9	52.7
	女性	(38)	(75)	(113)
		33.6	66.4	47.3
總計	(91)	(148)	(239)	
		38.1	61.9	100

$\chi^2= 1.798$ df=1 p=.180				
年齡	~29	(14)	(23)	(37)
		37.8	62.2	15.5
	30~39	(21)	(41)	(62)
		33.9	66.1	25.9
	40~49	(33)	(47)	(80)
		41.3	58.8	33.5
50~	(23)	(37)	(60)	
	38.3	61.7	25.1	
總計	(91)	(148)	(239)	
		38.1	61.9	100

$\chi^2= .809$ df=3 p=.847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32)	(63)	(95)
		33.7	66.3	40.4
	高中職士官	(50)	(69)	(119)
		42.0	58.0	50.7
	專科以上	(7)	(14)	(21)
		33.3	66.7	8.9
	(89)	(146)	(235)	
		37.9	62.1	100

$\chi^2= 1.761$ df=2 p=.415				

表二：政治意識與民族認同的改變 (1998 & 2000)

	台灣民族主義		實用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	
	未改變	改變	未改變	改變	未改變	改變
低(2-6)	(13)	(28)	(31)	(24)	(6)	(19)
	31.7	68.3	56.4	43.6	24.0	76.0
中	(56)	(92)	(165)	(117)	(41)	(70)
(7-10)	37.8	62.2	58.5	41.5	36.9	63.1
高	(22)	(28)	(51)	(21)	(18)	(18)
(11-13)	44.0	56.0	70.8	29.2	50.0	50.0
總計	(91)	(148)	(247)	(162)	(65)	(107)
	38.1	61.9	60.4	39.6	37.8	62.2

表三：族群認同的變化 (1998-2000)

(N)	2000				
	台灣人	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中國人	其他	總計
橫百分比					
直百分比					
1998					
台灣人	(282)	(135)	(34)	(9)	(460)
	61.3	29.3	7.4	2.0	--
	63.4	26.1	21.4	39.1	40.2
台灣人也是中 國人	(132)	(316)	(81)	(13)	(542)
	24.4	58.3	14.9	2.4	--
	29.7	61.0	50.9	56.5	47.3
中國人	(20)	(58)	(43)	--	(121)
	16.5	47.9	35.5	--	--
	4.5	11.2	27.0		10.6
其他	(11)	(9)	(1)	(1)	(22)
	50.0	40.9	4.5	4.5	--
	2.5	1.7	.6	4.3	1.9
總計	(445)	(518)	(159)	(23)	(1145)
	38.9	45.2	13.9	2.0	

$\chi^2=211.795$, $df = 9$, $p < .001$

參考文獻

- 黃興濤，2002，〈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歷史考察〉，《浙江社會科學》，1：128-140。
- 李國祁，1994，〈滿清的認同與否定—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91-13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吳乃德，1993，〈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33- 61。
- 吳乃德，2000，〈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台灣政治學刊》，4：57-103。
- 吳乃德，2002，〈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台灣社會學》，4：75-118。
- 徐火炎，1996，〈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台灣政治學刊》，1：85-127。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 Berlin, Isaiah, 1996. *The Sense of Realit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Publishers.
- Breuilly, John. 1982.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erulo, Karen A. 1997. "Identity Construction: New Issues, New Direc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385-409.
- Chu, Yun-Han. 2004.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Prospe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ian Survey* 44 (4): 484-512.

- Connor, Walker. 1978. "A Nation is a Nation, is a State, is an Ethnic Group, is 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 (4): 377-400.
- Connor, Walker. 1994.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nverse, Philip E. 2000. "Assessing the Capacity of Mass Elector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 331 °
- Hardin, Russell. 1995. "Self Interest, Group Identity." In *Nationalism and Rationality*, eds. Albert Breton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on, Henrietta. 2001. *Inventing the Nation: China*. London: Arnold Publishers.
- Hechter, Michael. 2000. *Containing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roch, Miroslav. 1985.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udt, Tony. 1998.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Blum, Camus, Aron, and the French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ohn, Hans. 1952. *Prophets and Peoples: Studi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Nation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Co.
- Laitin, David D. 1998.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rsh, Robert. 2002.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aiwan." In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Nation*, ed. S. Corcuff. Armonk, New York:

A. E. Sharpe Inc.

Miller, David. 1995.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iou, Emerson. 2004. "Understanding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Its Polity Implications." *Asian Survey* 44 (4): 555-67.

Smith, Anthony D. 1986.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Toolis, Kevin. 2000. *Rebel Hearts: Journeys within the IRA's Soul*. London: Picador.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mance and Bread: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Identity Change in Taiwan

Naiteh Wu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conflict of national identities has surfaced as the most salient issue in Taiwan's politics since the country became a full-fledged democracy in the late 1980's. The studies on nationalism in Taiwan have also been mushrooming in the recent years. Many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a steady trend of identity change in the past decade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ce: the rise of Taiwanese identity with the decline of Chinese identity. Using the data collected in a panel study of interview surveys conducted in 1998 and 2000, this paper however finds the high volatility of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Significant portions in all three major nationalist groups, namely the Taiwanese nationalists,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and the pragmatists, had changed their identities in the period of two years. This paper also weighs the effects of material interests and affection as two contrary factors on the change of national identity. While the former, coming from the economic inducement of China, drags people away from the position of Taiwan independence, the latter, based on the cultural-ethnic identity with Taiwan, consolidates this posi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in the particular period when the surveys were conducted, the consolidating effect of the ethnic-cultural identity on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seemed surpassing the straying effect of rational calculation of material interests.

**Keywords : national identity, identity change, ethnic identity,
Taiwan-China relation, rational choice**